

童年

任林舉

鄉愁的胎記

有人去了落後鄉村，在微信裏發一個視頻。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視頻的內容，只是無意、隨便一點。沒想到，就那麼輕輕一點，竟然會惹出那麼大的一個聲響，「轟」的一下，時光就退到了四十年前。

望着那一群從六歲到十二歲不等的孩子，我竟然陷入長久的迷茫。我在那些孩子中仔細尋找、辨認，想確定到底哪一個是我。

我也記不清到底是從六歲還是八歲開始，我就和視頻裏的孩子一樣，經常有一大摞體積遠大於自己身體的柴壓在肩上，趑趄着，行走在高低不平的田壠之間或鄉村的土路上。遠遠看上去，似有幾分隱隱的悲愴。

其實，過去和現在的很多人並不真正了解我們的心情。當有柴壓在肩上的時候，我們的心裏並不難過。最難過的是，尋尋覓覓了很久，也沒有在赤裸的平原上草原上拾到多少可供背負的柴。所以，那時，我也會像視頻裏的孩子一樣，儘管衣衫襤褸、氣喘吁吁，臉上仍然會掛着快樂、滿足的微笑。

不僅僅拾柴、生火燒飯、挖土豆、背石頭、餵豬餵雞、替父母照看比自己小的孩子、扶着比自己還高的犁型地，我還要幹其他更加繁重的家務和農活。記得十三歲那年，父親割兩壟穀子，我就得緊跟着他割完一壟。後來

，我曾經和一些人，比如說我身邊的年輕人或者我自己的孩子說起過我童年的經歷，但沒有人相信那是真的。他們沒有直截了當「揭發」我吹牛或故弄玄虛，但我卻能從他們的表情和眼神中讀到明顯的不屑。我知道，他們對人生中那些沉重的或有可能耗心、耗力的東西，有着先天的反感和抵觸。

這也並不奇怪，因為他們和我，或者準確地說，他們的當下和我的過去，並不在同一幅圖畫之中。兩幅圖畫可以相互打量，卻永遠整合不到一個維度。現在的人們，對待時間深處的過往，往往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就如對待屬於另一個世界「信則有，不信則無」的「靈異」事物。他們以為我要以自己的人生苦難教訓或威懾他們，而我卻只想告訴他們，在那種情境下，我並不覺得困苦，反而，我們的內心很豐盈，因為我承擔了人生理應承擔的重量。

後來，我終於還是醒悟過來。視頻裏的那些孩子並沒有哪一個是我，他們只是我相似的過去，是我遺失很久的童年的幻影。我之所以要一遍遍翻看，是因為心中仍有太多的懷念和不捨。

這時，視頻裏的一段歌曲響起來，是那個蒙古族男孩烏達木演唱的《夢中的額吉》，歌詞的具體內容我仍然一句不懂，但我卻從旋律中感受到一種刻骨銘心的憂傷。於是，淚水從我已經漸漸蒼老的臉上悄然滑落，而我卻不知道那淚水是因為那些畫面還是因為歌曲的旋律而起。



燈下集

同一個大中華地區的放牧人，遠處是無邊的遼闊天地，眼前是細微的草木風景，而他樂此不疲的馳騁其間，目光所及之處，皆成為案頭素材，化為筆下一幅大中華文化地圖，譜為吟唱不斷的《生命的牧歌》。

牧歌不斷，讓心靈甦醒。江迅多年來著述不斷，他旺盛的精力和源源不斷的生產力始終為人所驚嘆，而翻開此書的目錄，各式各樣的題材和新鮮語彙令人目不暇接，這位老媒體人的新潮更讓我輩慚愧。他笑談「單身狗」噢「狗糧」，也知道「前男友比我過得好果茶」，還會自嘲幾句「保溫杯泡枸杞」。而流行現象背後所蘊含的深層社會因素才是他真正思考和關注的焦點，他認為「旅行青蛙」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為人們找到宣泄情感的出口，命中當下年輕人內心最大的矛盾，背後映射着年輕人的內心孤獨；他也評價「小豬佩奇」的流行文化背後，是一種「低智」或「反智」行為，是不可取的「幼稚病」。透過表面現象看本質，是江迅的思考深度，而從一件看似簡單的小事，引申到其他領域的思索，則需要更廣闊的視野和知識體量。

江迅從奧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語》談到「愛

宏觀看社會 微觀寫人生

——江迅新書《生命的牧歌》讀後

袁瑋婧

情教母」瓊瑤，從引發內地熱潮的泰國電影《天才槍手》看中國國產青春片，看張艾嘉新片《相愛相親》而引出「文化養老」的社會話題，以輕巧題材切入社會新聞，讀者的思維也隨之而馳騁萬里。一支筆暢談大中華時政熱點，另一支筆訴說柔軟溫情，江迅總是在細微中見真情，字裏行間是對社會的細心關照。他在《牽手到老的背影照》中談到一個四川八〇後女孩搜集一百多張牽手老人的背影照片，如同搜集攜手到老的愛情故事，「是一種對天長地久的渴望，對惺惺相惜的留戀」；他以一段名為《牽媽媽的手》的微視頻，再談空巢老人，勸年輕人「不要在遙遠的距離中隔斷了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遺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拚搏中忽略了真情」。

身為資深媒體人，江迅所訪問過的各界文人政客更不在少數，書中紀錄了他們不少獨家訪談和交往軼事，如專訪稱為「中國第一造反派」的聶元梓、知名學者劉再復，以及多次拜訪星雲大師的故事等。更為可貴的是，江迅紀錄了他與香港文壇宗師劉以鬯最後交往的日子。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江迅帶着蛋糕去探訪當日九十九歲生辰的劉以鬯，劉以鬯躺在床上，唱了生日快樂歌和一首法語歌。今年四月十八日，劉以鬯坐在輪椅上，由劉太太推着，來到太古城廣場散步，到咖啡館吃個下午茶，並像個孩子般不顧回家。這是江迅最後一次見到他，六月八日，百歲的劉以鬯在香港去世了。江迅原本策劃在七月香港書展舉辦的慶祝劉以鬯百歲活動，也轉而變成了對



江迅新作《生命的牧歌》作者供圖

這位香港文學泰斗的追憶和紀念，這一切背後的故事婉轉曲折。

書中也一併收入幾篇追念逝者而作的文章，不論是二十六歲的林奕含之死，還是八十九歲余光中的飄然仙逝，江迅皆未缺席評議紀念。包括在柏楊逝世十周年之際對他的價值再論，以及沉痛悼念他的老友、曾任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王占軍。他的交友廣泛着實令人艷羨，他的一片真情又令人為之動容。宏觀看社會，微觀寫人生，江迅樂此不疲地以文字紀錄着這個時代的千變萬化。他孜孜不倦地書寫背後，是對世界的好奇目光和對生活的滿腔熱情，在這個衆聲喧嘩的時代，這樣一個執著而忠於紀錄的聲音，愈加顯得珍貴起來。

雙重身份的音樂家

盧定彰



眾樂

回望西方古典音樂歷史，很多赫赫有名的作曲家本身亦是傑出的演奏家。巴哈精於管風琴、小提琴和大鍵琴，長年於教堂和宮廷擔任樂師；貝多芬、李斯特和蕭邦定期舉辦鋼琴演奏會，彈奏自己的作品；拉赫曼尼諾夫於他享負盛名的《第二鋼琴協奏曲》和《第三鋼琴協奏曲》的首演場上，親自擔任鋼琴獨奏。到了二十一世紀，這個傳統開始出現改變。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因為音樂於二十一世紀開始「學科化」，每個範疇變得相對獨立，各自成為一個專業——例如器樂演奏、作曲、民族音樂學等，以致很多人都會集中發展一項專業。反觀流行音樂的世界，很多搖滾／爵士樂手都一手包辦作曲和彈奏。在當代古典音樂的場景中，作曲家與演奏者的身份基本上是分開的。作曲家完成作品後，便交由樂手演奏，身兼專業演奏家的作曲家可說是鳳毛麟角（作曲家兼任指揮卻大有人在）。具有兩項專業的音樂家於現今世上難得一遇，香港卻出產了一位演奏與作曲皆精的年輕人——他便是長笛演奏家／作曲家李一葦（Angus Lee）。

Angus小時候參加話劇訓練，因為太過好動活躍，母親便讓他學習長笛。Angus坦言初時對長笛的興趣不大，不過那時正值「沙士」肆虐期間，他放假賦閒在家，便整天練習長笛，漸漸培養出興趣。半年後，他獲香港演藝學院取錄為初級音樂生，正式開始有系統的音樂訓練；當時年方十歲。中學畢業後，Angus立志從事音樂事業，先後於香港演藝學院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完成學士和碩士課程，主修長笛。二〇一二年，他獲香港電台選為「樂壇新秀」，現為香港創樂團成員和香港小交響樂團的特約樂手。

在演藝學院學習期間，Angus已經雙線發展，主修長笛演奏的同時，亦醉心創作。他的第一首作品（管樂四重奏），便是在自己的演



香港長笛演奏家／作曲家李一葦（Angus Lee）作者供圖

奏會上由他和演藝的同學合奏。學生時代，他每年最少撰寫一首作品公演。碩士畢業以後，Angus愈發積極創作，踴躍參加世界各地不同的作曲工作坊和大師班（去年暑假，我便與他結伴參加了一個在意大利舉行的作曲工作坊）；同時亦開始獲不同的樂團委約創作（包括香港小交響樂團和香港創樂團），作品陸續於本地和國際藝術節亮相。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晚上，Angus將聯同鋼琴家張緯晴及許榮臻，舉行一場由康文署主辦的長笛演奏會，表演曲目包括一首他的新作。Angus奏過的音樂多不勝數，我好奇問他怎樣挑選是次演出的樂曲。Angus說：「我從長笛音樂的整個發展史去構思。這次選擇的作品，都是很有代表性的長笛音樂。每一首在初發表的年代來說，都各自展現了長笛演奏的一些嶄新技巧，並且開發了這個樂器的一些潛能。例如：朱里維（André Jolivet）的《里諾之歌》（Chant de Linos）示範了長笛演奏較低聲部的可能；曼托瓦尼（Bruno Mantovani）的《四首亞美尼亞的旋律》（Quatre Mélodies Arméniennes）是長笛演奏微分音（microtones）的實驗；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降E大調長笛及鋼琴奏鳴曲》（Sonata in E-flat for Flute and

Piano）原本是寫給小提琴和鋼琴的，我認為，透過演繹不同樂器的改編版本（transcription），一方面可以探索原版音樂的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亦可以發掘長笛未為人知的一面。」

至於Angus的新作，則為長笛獨奏和電子音樂而寫，名為《Lapsus Memoriae》，是他對香港的一份回憶。Angus表示：「兩年前英國學成歸來，我對『香港人』這個身份很有感觸。回港後，我覺得社會上很多東西都改變了，所以，我想透過這首作品，表達幻想與記憶之間的對照。作品的電子音樂有兩部分，一部分是預先製作的錄音，另一部分是長笛演奏與電子音樂的現場互動效果。這首作品以「語言」為創作靈感，觀眾會從錄製的電子音樂部分，聽到加了不同聲效的三種語言：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它們都是香港常用的語言，不過經過電腦處理後，聲音變得模糊。這就好像我對香港近年來的感覺——既熟悉但又有點遙遠。」

除了作曲和演奏外，Angus近日亦忙於籌辦新成立的本地室內樂團NOVA Ensemble。NOVA Ensemble將參與第一屆Prism Chamber Music Festival，十月十八日晚上會聯同來自法國的豎琴家Mélanie Genin在Hotel Stage舉行開幕音樂會，喜歡坐樂的朋友不妨留意。

深圳之秋

何 婕



人生在線

深圳與香港一衣帶水，氣候也自是相差無兩。常聽遊客抱怨說，香港沒有秋天，少了點兒味道，其實，深圳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但平心而論，若真在深圳住久了，你就會發現，深圳不是沒有秋，只是這南方的秋，不似北方那般金燦強烈罷了。

周末的一大早，五點多就趕到公司集合一起去爬梧桐山，想起過去的自己，是個跑八百米都要東躲西藏，爬山沒到半山腰就喊累的人，可是今年的自己，不僅僅報名跑了十公里，還去爬了梧桐山。

一年前的我大概不能相信現在的自己居然會是這樣熱愛運動的吧？而恰恰是運動，讓我了解了深圳的秋。

在曾經一段很長的日子裏，我都覺得爬山是一件很枯燥無味的事——就這樣沿着山路一直走，身處熱帶地區，四處都是常綠植物，秋天也並沒有出現層次分明的金黃落葉，想想都無趣。可是當我真的開始爬山了，這才發現，每一處都有每一處的風景，只是看你是用有色眼鏡來看它，還是發現美的眼睛來看它。

深圳梧桐山裏的每一棵樹我

都叫不出名字，飄落在地上的白花瓣以前我不上山時從來都沒有見過……秋來登山，我才知道，那種騰雲駕霧的感覺，當登上山頂時是真切存在的。南方秋日裏的雲霧就是這樣的近在咫尺，像在夢裏一樣奇幻。

登山的路上，每隔一段都會有小攤販賣一些酸蘿蔔、鳳梨、青瓜之類的，走累了就買一根邊走邊啃，在深山老林裏毫無顧忌地大笑又何嘗不是一種逍遙呢？

或許，有人會問，我是怎麼就開始轉變的呢？我想，最大的原因還是榜樣的力量吧。其實，剛剛開始跑步、登山的時候，一公里我就要停下來三、四次，爬一小段路就要坐涼亭，但榜樣在旁，督促鼓勵，慢慢的，我也是成為了一個能跑十公里深馬（深圳馬拉松）的人了。所謂「近朱者赤」，當你的身邊有朋友一直在堅持跑步，身材好，樣子漂亮，追求者衆多時，像她／他看齊就會變成一種魔咒，驅使着你去運動，去保持健康而美好的身體狀態，久而久之，自然就產生了心態上的轉變。

深圳的秋，在運動的人們眼裏是涼爽舒適的，是可以登高望遠的，是可以為馬拉松做準備的。果然，生命在於運動，運動讓本是平凡的秋，也有了不一樣的美好。



東西走廊

美國學生問我：大學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到底是做什麼的？在學生心中，校長（President）是最高領導，和他們生活發生直接關係的還有分管教育的副校長兼教務長（Dean）及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教務長。由六名教授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就不知是何方神聖了。

儘管在美國這所大學任教多年，過去我對執行委員會也不甚了了，只知道它是「教授治校」原則的具體體現，代表全體教授的意願。二〇一七年春季我在教工選舉中意外當選，成為執行委員會成員，並於當年秋季走馬上任，任期兩年。當時我系主任的任期還有兩年才結束，行政工作的分量已經很重，並無競選意願。孰料同事們厚愛，事先也沒徵求本人意見，就在我缺席的情況下提名、投票，將我選上了。

執行委員會六名成員包括「教授會主席」，人文、社科、理科三大組的主席，再加兩名不分組別、代表全校的成員（at-large

member），我就屬於最後這類。趕鴨子上架，服務一學年後，我多少了解了該委員會的常規事務和操作流程。

大學僱員分教學人員（faculty）與職工（staff）兩種。前者指擁有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等職稱，要教課或直接輔助教學的人員，包括體育系的教練、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還分長期工與臨時工。後者既包含校長、教務長等高層管理人員，也包括負責文祕、IT、學生工作、宿舍管理、基建、餐飲、保潔的各類僱員，一般不教書。執行委員會主要分管與教學有關的事務，但有時也會被要求對涉及廣大學生與員工的重大問題發表意見。當時我回答學生：校長、教務長相當於「白宮」，是三權分立中的行政部門，我們則是選舉產生的議會。現在想想，這個比方不夠確切。全校全時工作的教師對涉及教授自治的相關政策、條例都有投票權

。如果他們是「議會」，我們就是提供指導意見的「籌劃委員會」；如全體教師是「人大」，我們就是「人大常務委員會」。根據大學「基本法」《教師手冊》規定，執行委員會需就校長、教務長提出的政策問題進行討論，提供建議，對大學其他各委員會的詢問作出答覆，並可指定相關人員對重大問題進行調研，聽取意見、作出決定。這樣看來，我們也承擔了「政協」的部分職責。

執行委員會每周三下午四到六點開例會，有需要時增加特別會議，一般事務也可通過電子郵件討論、表決。例會由校長主持，校長不在由教務長主持，他倆都不在就由教授會主席主持。另外配備一名常任書記員，每次會議做好記錄，會後發給參會者審批、修改，通過後向全校公布摘要。校長、教務長不參與投票，但在表決結果三比三持平的情況下，校長能投決定性的一票。這個程序

馮 進

保證了決策公平、透明，在時機未成熟前也能保密。

執行委員會成員還各有分管任務。教授會主席的責任最多，需要同時參與學科建設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人事委員會甚至福利委員會等的日常工作，人文、社科、理科三大組主席則每年要評工資，我這個「編外」成員則必須幫助審核、批覆上報到教務處的、各部門的年度財政預算。另外，各系招聘時，總要有兩名委員會成員擔任面試官，寫下報告。平日校內外的意見、反響，我們在每周例會上也會反映、討論。

這一學年，執行委員會討論的事務五花八門，從財政預算、教工福利、招生政策、招聘決定這類「大事」，到學生對教授的教學評估是否改用電子版，上課時能否錄音、錄像這類「小事」，無所不包。開會當然不輕鬆。會前要閱讀大量資料，分析總結。會

上要聽取報告，參與討論，言之成理，無法「摸魚」。遇到和同事意見不統一時，原則性和靈活性要結合，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

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個性、不同背景、不同理念帶來的各種矛盾張力。教授和「有關部門」之間、和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立場不同，看法本就存在差異。各位教授成員還代表不同的科系，難免有各自獨特的視角。從這一學年的經歷來看，同事們一般都目標一致，能從大處着眼，與校長、教務長的關係也較融洽，在學校好幾樁重大事情上作出了統一決策。

有曾經供職執行委員會的同事報怨自己是「橡皮圖章」，校長對他們只是「面子情」，具體操作起來還是我行我素。我倒沒有很強的負面觀感。其實，在美國大學擔任系主任、執行委員之類的工作主旨都在「服務」，權柄風光談不上。只要把握好反饋「群眾呼聲」，加強與高層溝通的基本工作，就不會有失落感。說到底，「流水的高層，鐵打的教授」。校長、教務長五年一任，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如果願意，卻可以長長久久待下去。